

试论军人政治与民主化进程

——以土耳其 1980 年政变为例

周 术 情

内容提要 20 世纪 70 年代土耳其遭遇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各届政府无力应对，最终导致军队干预。稳定国内局势成为政变后军方的首要任务，构建新的权力架构是政变的逻辑延伸。1982 年宪法是文官政治恢复的重要标志，翌年全国大选则是恢复文官政治的实质性步骤。恢复文官政治使土耳其政变获得了异于南美洲国家军事独裁的特征。土耳其军方发动政变，旨在维护自身利益，其客观后果则是民主事业的“归位”。1980 年政变并非土耳其民主发展的悲剧，而是土耳其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缩”；不是民主发展遇到的挫折，而是民主发展模式的调整。

关 键 词 土耳其 政变 军人政治 文官政治 民主

作者简介 周术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071）。

军队干预政治是 20 世纪中东诸国的普遍历史现象。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最民主的国家之一，军队干预政治的现象甚为突出，军人政治是土耳其民主化进程中常为人所诟病的一个方面。军人政治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值得探讨，学界已对此展开深入研究，且有颇多成果。但对于军人政治是否一定与民主政治相背离，学界并无共识。¹ 本文试图结合土耳其 1980 年政变的历史背景，阐述军政府的若干行为，分析政变的历史缘由，并就政变的性质、意义，以及军人政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略陈管见。

国内危机与民主的表象

1950 年，土耳其实现政权和平更迭，其政治民主已有初步发展。随着 1961 年宪法出台，国内政治环境愈加宽松，诸多新政党相继建立，土耳其进入相对民主的时代。更为自由的宪法体系为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宏阔的活动空间。各政治集团相互争斗，引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1971 年所谓“备忘录政变”之后，在军方引导下新成立的政府未能禁绝大规模暴力活动，土耳其处境艰危。

土耳其政党间实力相对均衡给尚未成熟的政党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1973 年土耳其大选后，几乎无一政党能够成为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党进而独立组阁。因此，1973~1977 年土耳其均由联合政府执政，政治呈现不稳定状态。埃杰维特在 1974 年塞浦路斯危机中颇受欢迎，但他也无足够能力利

¹ 相关问题的主要观点如下：军人干政将经历若干年民主实验的国家推回到传统的统治模式；军队在创立现代政治结构、促进社会流动并通过各种方式将更多民众卷入政治生活方面有积极意义；军队属于“新中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处理文官政府的腐败与低效、并推动社会发展的组织。See Kemal H. Karpat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Turkey, 1960–1964: A Socio-Cultural Analysis of a Revolu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5 No 6 October 1970

用这一优势改变共和人民党的窘境。1977年大选中共和人民党虽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却同样不能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从而凭一己之力组阁。¹

政府权威遭到削弱是政党之间均势状态的直接后果。脆弱的政府对许多难题束手无策，法律和秩序亦无法得到有效维护。“备忘录政变”后成立的埃里姆政府仍无法阻遏国内各集团之间的恶性竞争，政府威权的重建困难重重。1971年“备忘录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加速了社会改革，然而，不稳定的局面依然没有得到控制。为稳定局势，政府采纳了由共和人民党和救国党提出的大赦法案，赦免了许多被监禁的左派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和恐怖分子，但政治平衡仍然无法恢复。^④ 混乱局势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发展到了暴力冲突的地步。政府在行政能力方面的缺陷加速了混乱局面的蔓延。政治上的对立更加严重，教师和其他一些专家，甚至警察都分成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⑤ 1977年大选后，这种状态仍在延续。这一时期正义党和共和人民党均处于调整时期，其选票被新成立的政党分享，主要政党之间的均势日渐明显。1978年1月，埃杰维特终于组建了自己的政府，但他同样没能恢复政府的权威，实现稳定局势的目标遥遥无期。

在土耳其，政治两极分化导致街头混战和暗杀活动渐次升级。德米雷尔和埃杰维特均成为反对者的攻击目标，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受到严重威胁。政治暗杀是这一时期暴力活动的重要形式。土耳其中央政府长期的政治真空被左右两派发起的暴力和恐怖活动所填补。至1980年中期，每天有20~30人被夺去生命。^{1/4}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来实施法律和维持秩序，暴力和恐怖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极端主义好战分子扩大了暴力活动。政治暗杀已波及议会成员、离职部长、著名记者和大学教授，^{1/2} 其中一些受害者属于温和派。对该派的暗杀伤害了政治中间派，加速了两极分化进程。暗杀并非暴力活动的唯一形式，大规模的社区冲突把暴力活动推向新高潮。在许多城市里出现了社区冲突，种族和教派矛盾凸显。这些冲突被极端分子利用，使政治暴力的基础扩大到比较危险的程度。1980年7月爆发的“乔鲁姆事件”和“法特撒事件”充分暴露了隐藏在这些危机背后的政治阴谋。处于右派立场的军官加速了对左派的袭击，非法左派组织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还击。^{3/4} 埃杰维特和德米雷尔政府连续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而其成效并不显著。

土耳其的危机不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蔓延，还殃及国民经济。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恶性通货膨胀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困境。无休止的工人罢工和政府推行的安居工程使通货膨胀率增加了两三倍。^⑥ 通货膨胀的后果是土耳其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居高不下。据土耳其国家计划组织统计，土耳其民众的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从1977年的36%下降到1983年的21%，实际工资在1980年后下降了45%，失业率为15%。^⑦ 然而政府缺乏有效手段去改善经济发展状况。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导致土耳其经济危机加剧的另一个因素。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和1975年美国的贸易禁运等，都是土耳其政府要直接面对的难题。土耳其经济的蹉跎状态反过来又影响该国的政治发展。

¹ See Frank Tachau,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1945-1980", in Metin Hepar & Jacob M. Landau, 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91, p. 112.

^④ 参见 [美国] 凯马尔·H·卡尔帕特著；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4页。

^⑤ See Kemal H. Karpat, "Domestic Politics", in Kemal H. Karpat, ed., *Studies on Turkish Politics and Society: Selected Articles and Essays*, Leiden: Brill, 2004, p. 136.

^{1/4} Dankwart A. Rustow, "Political Parties in Turkey: An Overview", in Metin Hepar and Jacob M. Landau, 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1991, p. 19.

^{1/2} See Frank Tachau & Metin Hepar, "The State,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in Turke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6, No 1, 1983, p. 24.

^{3/4} See Jim Paul, "The Coup", *MERP Report*, No 93, 1981, p. 3.

^⑥ Kemal H. Karpat, op. cit.

^⑦ Feroz Ahma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3, p. 205.

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危机的政治内涵是民主的发展尚不成熟。¹六七十年代,土耳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给人以民主的印象。“五二七事件”结束了民主党具有专制倾向的统治;1961年宪法与1924年宪法相比更显自由和民主。诚然,与土耳其历史上其他时代相比,这一时期的土耳其政治无疑更为民主,然而主权在民、宪法至上的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囿于国内条件,政党政治的运作常常悖逆民主原则,政党意志多由政党领导人决定。在这种情境下,国家意志并非民众意志的真实表达,民主的完全实现尚需时日。理想的民主应以民众的福祉为归宿,而此时的“民主”给土耳其带来了混乱和动荡,这既非民主的初衷,也不是民主的本质所在。民众的要求得不到真切表达的所谓民主,自然远离了民众的期许。因此,谋求改变的呼声出现在这个“民主”的时代乃是合乎情理之事。

1979年11月,德米雷尔政府试图控制猖獗的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努力无果而终。政治暗杀和抢劫银行案件趋增,恐怖活动在全国肆虐,土耳其成为不安全的地方,人们要求某种干预的呼声渐高。救国党组织了一系列要求建立伊斯兰秩序的游行示威,这成为干预的导火索。土耳其政府宣布实行戒严,但仍无法稳定局势。时至1980年夏,土耳其已成为人间地狱。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的持续冲突,以及总统换届选举所带来的不稳定加速了土耳其局势的恶化。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军队再次发动了政变,接管了政府。

军人政治与文官治理模式

在土耳其,拟定国家存在与发展的方略是政变后军方的困难所在,稳定国内局势则是军方的首要任务。新领导集体的建立是推行新举措的起点。土耳其新领导机构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总参谋部长埃夫伦将军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德米雷尔政府和原议会被解散,军政府总理为海军上将乌鲁苏。显然军方完全控制了政府。军人集团尽可能减少文官的政治参与,削弱其影响力。军事当局废止了现行宪法,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工会活动和工人罢工均被禁止。稳定局势的内容还包括整肃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参与过谋杀活动的好战分子被批捕和受审判,秩序与和平很快得以恢复,这对于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大有裨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是军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其核心内容是清算政变前的政党。军人集团把政变前的危机归咎于政党及文官。因此,民族行动党和救国党的领导及其他党员都受到指控。1981年后军方对政党的态度渐趋强硬,并最终“取缔所有政党和没收其财产”。从法律上讲,土耳其的两个主要政党即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均已不复存在。取缔共和人民党标志着凯末尔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演变的正式终结。^④构建新的权力体系是政变的逻辑延伸,也是政变后军方的第三个主要任务。强化总统权力是新权力架构的显著特征。1982年宪法将国家权力集中于总统。总统负责国家安全与独立,维护国家统一,还被赋予额外的立法和行政权力。^⑤总统的权力与过去一个时期相比明显加强,而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威则受到了挑战。政党作为议会构成的核心力量成为重点限制对象。军人集团对新兴政党予以严密监视,他们着力支持国家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匡助平民党成为官方的反对党,^⑥军方似已独掌乾坤。

土耳其新的权力架构有利于军人集团强化自身权力。军人统治集团被赋予广泛的权力,它左右着总统和其他重要领导人的选举。改革高等教育制度体现了军方权力在教育界的渗透与延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殊地位加强了军方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内阁有义务优先考虑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推出的

¹ See Feroz Ahmad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the Crisis in Turkey”, *MERIP Reports* Vol 93, 1981, p. 14.

^④ See Kemal H. Karpat op. cit. p. 140.

^⑤ Se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rticle 101-106 130 <http://www.byegm.gov.tr/mevzuat/anayasa/anayasa-ing.htm>, 2007年10月13日;《土耳其共和国宪法》(中文版),见姜士林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504页。

^⑥ See Dankwart A. Rustow, op. cit., p. 19.

“涉及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存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和保护社会和平与安全的措施”¹。结果军队在新政治架构中的权力大增。然而军政府亦有其难以摆脱的困境。人才奇缺是困扰军方的严重问题。军政府核心成员多为不谙治国之道的职业军人，对政务至为陌生。前政府虽人才济济，但许多人由于政治原因难以发挥作用。另外，军方面临一个理论性困境。既然军方宣称要恪守凯末尔主义，维护民主制度，那它就需要一种适合践行民主的形式，但军方对这种形式的实质及相关意识形态的范畴等素无清晰概念。显然除政党制以外确实难以找到更适宜民主发展的方式，是以军方所排拒的政党政治获得重生契机，其逻辑结果便是文官政治的恢复。

1960年以来土耳其历经3次政变，每次政变后均恢复了文官政治，这使土耳其的政变具有了不同于南美洲国家军事独裁的特征。1980年政变后，军事当局承诺在条件成熟时将政权交给文官政府管理。1982年宪法的出台是恢复文官政治的标志之一。该宪法乃是各派互相妥协的结果，几经修订至今仍然生效。1981年军方采取了建立文官秩序的第一步。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咨议会，其主要任务是起草新宪法，并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建议。咨议会最终拟订宪法草案，稍作修改后于1982年11月7日提交全民公决。在20690914名注册投票者中，实际参与投票者占91.27%，其中90%以上的人赞成新宪法。^④这一结果使军方认为，人民会支持军方的任何决定。新宪法是1961~1980年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总结与反映。在新宪法体系下，土耳其的最高权力由立法机构向行政机关转移，权力不平衡和缺少必要制约的状况有望改观。1982年宪法强化中央集权的趋势异常明显，然而它又为人民提供了控制制度的手段，即自由的选举和政党。人民可以通过选举来实现政权的更替，因而集权不会长期存在。1982年宪法比最初人们预期的要自由得多，它将为新的大选提供基本依据。

1983年选举是恢复文官政治的实质性步骤。1983年夏，土耳其当局允许自由建立政党，以便为秋季大选做准备。至1983年7月中旬，土耳其正式建立的政党达14个以上。选举前夕，国家安全委员会取缔了某些新政党以避免权力争夺。选举法本身也设置了相应的技术性条件使小政党生存艰难。最终只有3个政党获角逐议席的资格，它们分别是苏纳勒普领导的国家民主党、加勒普掌管的平民党以及厄扎尔为首的祖国党。1983年11月6日大选如期举行，结果祖国党获胜。选举结果表明，土耳其的基本政治结构仍然稳定。支持右派和中间派的选民占绝大多数；土耳其政治左派也没有出现分裂，政治右派的多维度已不明显。^⑤选举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起码要承诺做到发展民主和经济。这两个因素是1946年以来决定选举结果的共同因素。1983年后土耳其政治在实践中向文官政治转化。新上台的祖国党领导人厄扎尔逐步掌握了最高政策制定权，^{1/4}文官政治渐趋巩固。

军队作为“国家守护者”的角色定位决非军人集团在牢掌权力情况下还政于文官的动因。“还政义举”乃是源于政治文化、权力结构等限制因素。土耳其政党制的发展是理解军方此举的思路之一。自凯末尔时代始，政党治理一直是土耳其政治构建的主流形式，^{1/2}并逐渐得到土耳其政治家和民众的认可。政党政治在土耳其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这成为文官政治得以恢复的重要原因。另外，文官群体的不可替代性也是理解文官政治复归的线索。军方可以变更政府，但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土耳其的人力资源结构，而仅凭军方之力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必须依赖文官。政变和此后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实为该国诸多政治力量整合的结果。因此，尽管军方对政党政治和文官治理模式缺乏信任，却也不可弃之如敝屣，于是方有恢复之举。解读还政于文官政府的第三个思考方向是局势已得到控制，

¹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Article 118.

^④ Kemal H. Karpat op. cit., p. 141.

^⑤ See Üstün Ergüder “The Motherland Party, 1983–1989”, in Metin Heper & Jacob M. Landau ed.,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in Turkey*,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91, p. 153.

^{1/4} See Engun Özbudun *Contemporary Turkish Politics: Challenges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p. 118.

^{1/2} See Ahmet Kemal “Military Rule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Turkey”, *MERIP Reports* Vol. 122, 1984, p. 12.

且军方的利益已有保障。时至 1981 年，局势尽在军方掌控下。从前的政治领导人不再构成威胁，他们大多已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过去那些颇有影响的自由协会现也生存维艰。总体上看，军方确已控制大局，恢复文官政治只是治理模式的置换，对军方利益不会有太大冲击。最后，埃夫伦本人在由军人政治向文官政治过渡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¹

土耳其军方将政权交与文官政府使其干预政治的行为获得了新维度。“1983 年土耳其的变化使它拥有了不同于巴西、智利和葡萄牙的特征。”^④在这次政变近 20 年后，文官政治有了深刻的变化。1995 年的宪法修正案废止了 1982 年宪法中的某些条款。军人政治的痕迹在逐渐消退，文官势力日渐增益。因此，文官政治的恢复是考量 1980 年政变性质的不可小觑的因素。

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缩”

厘清土耳其 1980 政变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军人政治。吉姆·保罗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土耳其军方行动的支持是政变发生的重要原因。^④塔齐奥和赫伯将 20 世纪 70 年代土耳其政治的分裂与两极分化作为导致干预危机的基本原因。^¼卡尔帕特强调军队的干预是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½实际上，政变原因亦可从土耳其各政治集团之间角逐利益的角度予以开掘。

军方利益代表的缺位是政变不可忽略的原因。历史上共和人民党与土耳其国家是两位一体的。共和人民党被视为国家的保护者，军队自认为也负有类似的责任。实行一党制时期，土耳其军队与共和人民党的利益趋于一致，该党成为军队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1971 年埃杰维特成为该党的新领导人，共和人民党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土耳其政坛。该党的突变使土耳其军队失去了政治依傍。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后，共和人民党的左翼倾向给军方的印象是该党“在朝着反国家主义的立场转变”^¾。随着 70 年代政治两极化加剧，共和人民党逐渐告别它过去作为国家保护者的角色。^⑧该党的嬗变，以及政府无力维持其权威的状况使军方深感不安。这就意味着共和人民党与军队不再休戚与共，自不可成为军方利益的代言人。同时该党也缺乏足以主导国家发展的力量，其衰落之势日渐明显。因而该党与军方的分道扬镳亦属必然，军方利益代表这一角色仍虚位以待。另一方面，正义党并未取代共和人民党的位置，它有自己的利益诉求。1965 年后正义党声势日隆，逐渐发展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党。然而正义党不具备共和人民党的属性，无法取代共和人民党昔日的地位。作为民主党的继承者，它反对将政党的功能和责任提升到超经济、超阶级的状态，其反对的正是共和人民党及军方所倡导的国家主义原则。因此，正义党与军方旨趣殊异，缺少合作基础。基于上述认识，可对 1980 年政变的性质与意义略作爬梳。

学术界对土耳其 1980 年政变的评价颇多。弗兰克·塔齐奥认为：“此事件是土耳其民主的又一次裂缝。”^⑨提姆认为土耳其的民主被军队干预打乱了。^⑩卡尔帕特指出：“一个民主的时代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他又称，1980 年军队接管政府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显然，卡尔帕特所指的“民主”实为一种纯粹的民主制度，而非现实意义上的民主。否则，他无法解释“这次干预得到了民众的广泛

¹ See William Hale *Turkish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296.

④ Ergun Özbudun op. cit., p. 117.

④ See Jim Paul op. cit., p. 3.

¼ See Frank Tachau & Metin Heper op. cit., p. 25.

½ 参见 [美国] 凯马尔·H·卡尔帕特著；陈和丰等译：前引书，第 474 页。

¾ Frank Tachau op. cit., p. 112.

⑧ See Frank Tachau and Metin Heper op. cit., p. 31.

⑩ Frank Tachau op. cit., p. 113.

④ See Taner Timur “The Ottoman Heritage”, in I. C. Schick & E. A. Tonak, ed., *Turkey in Transition: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9.

支持”。得到民众支持的行动却是不民主的，或许在逻辑上并非谬谈，却有悖于民主的要旨，也远离了倡导民主的初衷。罗斯托写道：“从整体看，土耳其军队已经做到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土耳其民主的保护者和恢复者。”¹ 阿尤布认为，军队阻碍了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④ 以上观点的共同特征在于，认为只有文官政治才具有民主属性。结合土耳其军队的实际活动可以发现，这次政变有更丰富的内涵。

1980年政变并非土耳其民主发展的悲剧。是否满足民众的要求是评价这次政变的主要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和平与发展的共同问题。政府的首要职责在于为国民提供安全与生存保障。综观 20 世纪 70 年代的土耳其历史，这两个基本要素均处于缺失状态。民众对政党与选举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他们更关心安全与发展的问題。土耳其军队救平内乱，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环境，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军方重视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人民关心的另一问题。正义党严格的经济计划在将近两年里得到了军人集团的大力支持。表明军人集团可以跨越政治障碍，发展经济。厄扎尔在 1982 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后，他在任时的经济政策大多被沿用。^④ 所以军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安邦治国、顺民心之举自当决绝于“悲剧”。

军方亦非真正超脱，其利益要求彰明较著。共和人民党曾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是超阶级、超党派政治单位的代名词。时至 20 世纪 70 年代，它倏然蜕变，不再具有超党派和超阶级属性。此时武装部队恰好填补这一空白，借机主持“公义”，在保证军队利益的同时，结束了国家的混乱状态。军方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重合，塑造了武装部队的伟岸形象。然而军方无论在人事安排，还是在经济利益方面都满足了自己的要求。安全委员会凌驾于一切其他国家机构之上，国家要害部门都安插了军人。军方掌控庞大的经济网络。⁴ 1980 年政变后军方所控制的经济实体也在受特殊照顾和保护之列。这些事实反映了军方行动背后的驱动力乃是现实利益，并非抽象的爱国情结。

政变是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回归国情的推动因素。毋庸置疑，政变前土耳其在民主发展方面与过去相比确有进步。至少有更多政党和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意识形态呈现多元化趋势。然而这并不代表民主时代的真正来临，因为此时的民主是无序的。秩序缺失的民主不但不能带来安全与发展，^{1/2} 相反，它加剧了土耳其政治动荡，不利于国家事业的顺利开展，其意义稍显贫薄。1980 年政变其实是将民主限止在一个可行范围内，抛弃绝对的、抽象的民主，发展现实而非理想的民主，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逆转。

总之，1980 年政变可谓土耳其民主框架的“理性收缩”。军方的行为并没有真正破坏土耳其民主化进程，而是土耳其民主发展过程中一次缓解矛盾的行动。1980 年政变不是土耳其民主发展遇到的挫折，而是一次民主发展模式的调整。军方发动政变旨在保证军方利益，其客观后果则是民主事业的“归位”。政变让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回归现实，不再停留于理想状态。军人政治与文官政治的分野只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军人政治不等于专制，文官政治未见得即为民主。对民主的衡量标准不在于政权的军人特征抑或文官属性，而要看其是否“顺乎民意”。民主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受各种具体条件的制约，其进步不是直线式上升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调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责任编辑：徐 拓 责任校对：樊小红)

¹ Dankwart A. Rustow, op. cit., p. 20.

^④ See Mohammed Ayoub, “Turkey’s Multiple Paradoxes”, *Orbis* Summer 2004 p. 458

^④ See Feroz Ahmad op. cit., p. 7.

⁴ See Tim Jacoby,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and By the Military: The Regime Structure of Modern Turkey”, *Political Studies* Vol 51, 2003 p. 677.

^{1/2} 参见 [美国] 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7 页。

From Primitive Community to Nationalism Community

—Ziya Gökalp and His Study on Turkish Nationalism (1 of 2)

Liu Zhongmin

pp. 26– 30

The theory of Ziya Gökalp once played important role for members of Youth Turkey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from Pan-ottomanism to Kemal's nationalism. The main contents of Ziya Gökalp includes (1) Human being community has two branches Primitive community and nation. The primitive community includes four kinds of types: undifferentiated Communities with a clan basis, differentiated communities with a clan basis, tribal communities in which totemic institution is entirely lacking

degenerate primitive communities. (2) The identity of religion is a backward psychology identity corresponding to past empire and the identity of nation is corresponding to advanced national stat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historically to transfer from religious community to national state. (3) Advocating of secular nationalism, that is advocating dividing of religion from politics and objecting to religion's intervention in politics.

On the Strat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A Case Study on the 1980 Coup D'état in Turkey

Zhou Shuqing

pp. 31– 36

Turkish military power at last intervened politics in 1970s when Turkey met with sever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is and several governments failed to control the situation. The first thing for the military regime was to stabilize the civil situation, and rebuild new power structure was the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coup. In 1982, the implement of new constitution was the mark of recovering civil officer politics, and the substantial step to do that was to conduct the general election next year. The restoring of civil government helped Turkey to gain the reputation differently from some South American states

then were regarded as military autocratic regimes. The original aim for the military to launch the coup d'état was to maintain itself interest, but the result objectively was the "revision" of democracy. The purpose of the coup launched by Turkish military consists in maintaining the benefits of their own, and the consequence of the coup is to get the democratization to the right place. The 1980 coup d'état is not a tragedy of democracy, but the "rational reduction" of the democratic framework, not the frustr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but the adjustment of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mode.

The Russia– Turkey Relations Since 21st Century

Zhang Laiyi

pp. 37– 41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Russia and Turkey are trying to establish a new partnership relation with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long-term stability and bilate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dismissing historical fouls and intervention from U.S. There are frequent visits between the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have greatly promoted friendly cooperation in all kinds

of fields, and a stable and fine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urkey looks active and potential, and there seems great advantage of geopolitics and better realistic conditions for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new circumstance, Russia and Turkey will strengthen their friendly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their good cooperation will start new steps.